

VII.

经济理论研究概况

一年来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 进展和今后的趋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杨长福

1981年,全国人民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作出的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的方针,经济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主要表现在大幅度压缩了基本建设的投资,财政收支从有很大赤字达到基本平衡,市场物价总的说基本稳定,农业形势很好,日用消费品生产有较大幅度增长,人民生活继续得到改善。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开始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

我国的经济理论研究和讨论,大多是密切结合我国“八字”方针的贯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的。一年来经济理论的研讨,无论在深度上或者在广度上,都较前几年有所发展。由于经济理论领域研讨的面广,问题较多,本文不能一一涉及。这里只就若干综合性的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的问题,作一概略的介绍。

一、关于国民经济的调整 and 综合平衡问题

1981年初,我国面临财政上连续两年巨大赤字、国民经济潜伏着巨大危险的困难。党和国家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进一步的调整,调整的近期目标是要消灭财政赤字,达到财政收支平衡;停止财政性发行,做到信贷平衡;制止通货膨胀,使物价保持基本稳定。在这样的形势下,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理所当然地受到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的关注。与此同时,陈云同志早在五十年代后期就提出的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和建设规模要同国力相适应等经济思想受到了广泛的重视。

一年来经济调整的讨论紧密结合当前实际,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克服困难的办法,设想调整的目标和步骤,因而比过去的讨论更加深入。有的同志提出,摆脱困难的办法,一靠调整,二靠改革。调整的中心是压缩基本建设的规模,省出钱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979~1980年调整的效果不大,主要是积累基金压不下去,计划内的投资仍然过多,计划外的投资失去控制;其次,消费基金也增加得更多了一点,1980年社会购买力增加了200亿元,比前几年平均多了一倍多。克服的办法:一是继续压缩计划内的投资,不但国内的许多重大建设项目要下马,连从国外引进的许多项目也要停建缓建;二是严格控制计划外的建设;三是控制滥发奖金;四是“精兵简政”。有的同志提出了经济调整的目标,总的说来,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建立起一个以增产最终消费品为目标、比例关系较为协调、经济效益比较高、良性循环的经济结构。其主要标志是:第一,国民经济各部门、各部门内部以及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之间的比例关系大体协调;第二,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得到比较合理的利用;第三,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紧密联系,互相促进。为了达到上述目标,还提出了分阶段的实施步骤。

一年来讨论的进展,还表现在围绕着如何正确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产业结构(以及产品

结构、技术结构、能源结构、地区经济结构等)问题进一步展开了讨论。过去有的同志认为,我国的重工业发展过快,重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0%以上,是一种重型结构,应该考虑我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要加速发展农业、轻工业,建立一个轻型结构,使农业、轻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0%以上。但有同志不同意把产业结构划分为重型或轻型。因为这种划分并未概括其它生产部门如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也未包括商业、服务业、对外贸易等。即使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难以严格划分。有的同志认为,我国已形成的产业结构是一种紧张的、“挤压型”结构,就是说,无论是农轻重之间,农业和工业内部,基础结构部门与其它产业部门之间,“骨头”与“肉”之间,都是一方面挤压另一方面,关系绷得十分紧张。要改变这种紧张状态,就应该把“挤压型”结构改变为“舒展型”结构。也有同志认为,我国目前产业结构是低效型结构,它必须向既有良性循环、又有较好的宏观经济效益的高效型结构过渡。以上意见虽有分歧,但都是有益的探讨。如何吸收各种意见的合理部分,取其长而补其短,进一步研究和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产业结构,还有待经济理论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的努力。

年来讨论的进展,还表现在结合经济调整研讨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地区经济综合平衡以及地区平衡与全国平衡的协调问题。许多同志提出,综合平衡是国民经济全局性的宏观平衡,它要解决的是国民经济发展规模、速度、以及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比例关系。量力而行,量入为出,是搞好综合平衡的一项基本原则。要搞好综合平衡就必须实现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平衡,并要注意留有后备、留有机动、瞻前顾后、统筹安排。关于地区平衡与全国平衡的关系,许多同志认为,全国平衡指导和制约地区平衡,但不能代替地区平衡。地区平衡是全国平衡在空间上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实现全国平衡的基础,只有搞好地区平衡,使各地经济协调发展,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也有同志认为,地区经济中一些主要比例须服从全国的统一安排,一个地区不存在经济结构或农轻重的体系问题,因而没有必要和可能搞地区平衡。这些讨论,虽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但对国民经济的调整起了有益的作用。

至于调整中如何加快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如何把重工业转到为农业、轻工业服务的方向上来,调整期内要有一定的规模和速度,要注意加强能源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以及如何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企业的技术改造等,都有所讨论。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二、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

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以调整为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服从调整、促进调整、配合调整。按照这一要求,在农业、工业、财贸等领域,在所有制形式、计划管理体制、经营管理形式、分配形式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这对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搞活经济,促进生产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这些改革还是局部的、探索性的,工作中也出现了某些前后不衔接、相互不配套的问题。1981年,主要是巩固前一段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总结改革的经验,探索改革的目标和步骤。

为了选择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就要弄清有的一些什么类型的模式。我国原来属于什么类型的模式。有的同志综合各家学说,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划分为以下五种类型:(1)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型。其特点是所有三层经济活动,即宏观经济活动、企业日常经济活动和家庭(个人)经济活动的决策都集中在国家手中,是一种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实物分配型

的经济。(2)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型。其特点是宏观经济活动和企业日常经济活动这两层的决策权集中于国家手中；家庭(个人)经济活动的决策基本上是分散化的。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对经济的指令性计划管理很广很细，市场仅仅有时被利用来作为实现计划的工具。(3)改良的集中计划经济型。其特点是宏观经济决策权和企业日常经济活动的大部决策权集中在国家手中，小部分决策权下放给企业，家庭和个人经济活动的决策权基本上分散化。在这种体制下，国家计划的指令性指标有所减少，价值指标的意义有所扩大，但对重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仍然保留实物指标，社会经济活动基本上是由计划规定的，市场调节只起补充作用。(4)含有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型。其特点是只有宏观经济问题的决策是集中的，国家主要管有战略意义的经济活动。企业的日常经济活动基本上由企业自行决策，家庭(个人)经济活动的决策权也是分散化的。国家计划虽然也包括微观经济活动的内容，但一般不作为命令下达企业，而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和利用经济杠杆来诱导企业完成国家计划。(5)“市场社会主义”型。其特点是宏观经济、企业微观经济和家庭个人经济这三层决策都分散化、市场化，市场调节在整个经济生活中起主导作用，而计划的作用则不是很显著的。我国原来的经济体制属于什么类型？过去中外经济学者多认为是第(2)类型。在讨论中，有同志认为，我国从来没有实行过地道的第(2)类型，只能说基本上是第(2)类型，但同时带有第(1)类型的因素。

我国应当选择什么样的目标模式？在一年来的讨论中，多是集中在第(3)、(4)两种类型上，即改良的集中计划经济型和含有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型。对这两种模式具体选择上的分歧，有些同志倾向于前者，也有些同志倾向于后者。还有些同志主张把这两种目标模式结合起来，即大体上以第(3)类型作为中期改革的目标，第(4)类型作为长期改革的目标。

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的历史任务。在全面改革之前，必须要有充分的理论准备，以避免走弯路，取得预期效果。一年来的理论研讨，虽然还不充分，但比前两年有进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问题上。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在过去的讨论中，各种提法很多，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五种：(1)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2)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不提以谁为主)；(3)社会主义经济只有通过市场调节，不过大量的的是有计划的市场调节，少量的是自发的市场调节；(4)宏观经济由计划调节，微观经济由市场调节；(5)计划调节中包括了市场，市场中有计划，因而两个调节相结合的提法不妥。经过一年来的研讨，一些同志逐渐倾向于第(1)、第(4)种提法，但大多数同志提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或提在坚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还有些同志认为，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产品和企业应有不同程度的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有的同志还探讨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结合点和具体形式。这些，都加深了对于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的认识。目前，对于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以及二者的关系，还有一些不同看法。例如对于计划经济，窄的理解只限于指令性计划，而宽的理解则可以是指导性计划。又如，对于市场调节，传统的理解只限于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或通过市场价格的自发波动来调节，而也有人理解为自觉利用价值规律来调节，或者叫做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再如，对于计划与市场的主辅关系，有人从“板块结合”的意义上理解(经济的主要部分由计划管理，补充部分由市场调节)，也有人从“渗透结合”的意义上理解(宏观经济主要由计划管理，微观经济主要由市场调节)。看来，这个问题还需要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起来进一步研讨。

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问题，是讨论体制改革和计划与市场关系中必然要涉及的基本

理论问题。过去讨论中的看法，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五种：（1）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2）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3）社会主义经济既是计划经济又是商品经济；（4）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者说是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5）社会主义经济是含有商品关系的计划经济，或者说是存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计划经济。经过一年来的研讨，大多倾向于第（1）、第（5）种看法。许多同志认为，计划经济能够反映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要求，因而具有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而商品经济存在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它不能反映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说法，是把计划降低到不过是商品经济的一个属性，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落脚在商品经济上而不是落脚在计划经济上。其中有的同志把我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具体表述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消灭了剥削制度，实现了按劳分配和存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但也有同志认为，商品经济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统一，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重要的基本特征，但生产资料公有制、满足人民需要、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都是反映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同具有商品关系的计划经济的说法，含义是相同的。目前，虽然还存在分歧，但同前一阶段的分歧相比，在理论上还是前进了一步。

一年来，经济理论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还就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局部改革与整体改革的关系、外国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并有一定程度的进展。

三、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纠正经济工作中左倾指导思想和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和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在农业集体经济中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给农村带来的新变化，吸引着人们极大的兴趣。所有制形式和结构的变化，向经济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大量的值得研讨的课题。开始时，人们更多地注意城市和农村的集体所有制，研究维护集体所有制生产单位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等问题。接着，人们又把更多的注意转向恢复和发展城镇个体所有制问题、农村集体经济中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问题、各种联合经营的所有制问题、中外合资企业的所有制问题等等，以及由此而提出的我国现阶段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问题。

一年来，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研讨，是在所有制理论上的一大进步。有些同志指出，从多年来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变革的经验教训中，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不存在某种固定不变的模式或形式，并不是任何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都是适合特定的生产力状况的，因此也不是任何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都能有力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只有根据各种不同生产力的状况，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或其它所有制形式，才能推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在我国目前，生产社会化程度低以及生产力发展极不平衡，决定了所有制形式发展的不平衡，这是一个不可违抗的规律。同我国现实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所有制结构，只能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状况，不仅社会主义公有制必然有不同的形式并存，而且私有制或半私有制在一定范围内必然还会存在。这些问题，大多数同志已经取得了共同的认识。

对于所有制形式和结构的选择，是不是只决定于生产力，还有没有其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则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认为，选择什么所有制的形式和结构，最终要根据生产力的状况。但也要考虑上层建筑、历史条件、自然条件的制约和影响。例如，由于存在国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才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又如，由于我国已是社会主义社会，不允许剥削合法存在，所以在所有制结构中不能包括国内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有的同志则不赞成在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之外再加入上层建筑等因素，认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但它不能决定所有制，不能把影响作用、反作用与决定作用混为一谈。究竟生产力怎样决定所有制，究竟有什么样的具体的生产力才能建立什么样的具体的所有制，以及上层建筑等因素对所有制影响、制约到什么程度，都是有待于进一步研讨的。

一年来，许多同志对各种所有制存在的根据、性质、地位、作用、发展趋势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并有不同程度的进展。但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责任制的性质问题，国家所有制企业能否实行自负盈亏以及实行何种意义的自负盈亏问题，各种联合经营的所有制问题，个体劳动者的雇工及其界限等问题，还存在一些不同看法，需要进一步研究。至于对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地方出现的农民新的经济联合，它同社队集体经济的关系，以及这种新的经济联合的发展趋势，目前研究得还不够，更需要注意研究。

四、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效果问题

我国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经济效果问题的广泛研讨，是从五十年代末开始，1963年前后形成了第一次讨论高潮。那次讨论的背景，是1958年“大跃进”中不计成本、不讲效果，造成严重浪费，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困难和损失，使党和国家不得不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1963—1965年三年经济调整时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随即被“文化大革命”破坏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前两年，又出现一个新的冒进。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过去“左”的错误，提出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接着制定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新的“八字”方针的贯彻，经济效果问题再次被提出来，成为经济理论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广泛关注的问题，1981年形成了新的讨论高潮。

这次讨论，是在总结我国三十年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背景下，因而是在更深刻的基础上进行的。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相当长时期经济效果很差，人民生活的改善同人民付出的劳动很不相适应。1980年同1952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8.1倍，国民收入增长4.2倍，工业固定资产增长26倍，而全国人民平均消费水平仅提高1倍。为什么生产建设发展速度并不慢，而人民得到的实惠并不多呢？这同经济建设中浪费惊人、效果太低分不开。仅以基本建设来说，基建规模越来越大、建设周期越来越长、投资回收率越来越下降，经济效果越来越低，已几乎为人所共晓。这引起人们对经济效果问题的重视，是理所当然的。

一年来讨论的最大进展，是把经济效果问题提到了应有的高度。许多经济理论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认为，提高经济效果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从不良循环转向良性循环的关键所在。还有许多同志把提高经济效果看作是我国经济调整和改革的出发点，认为调整、改革的每个决策和措施，都要十分重视经济效果，以满足人民的需要。现在，经济效果问题已成为我国

经济建设的核心问题，成为经济建设新路子所应围绕着的中心问题。这就克服了过去那种把高指标、高速度作为目标的一套老的做法，确立了真正从我国国情出发，走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

一年来讨论的进展，还表现在从经济效益的一般概念，社会主义经济效益的实质和范围，经济效益和经济核算的关系，评价经济效益的指标和方法，深入到紧密结合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贯彻，从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的结合上探索全面提高经济效益的途径。因为经济效益是一个很综合性的问题，经济效益的高低，取决于多种因素。当前，要提高经济效益，必须认真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赵紫阳总理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经济建设十条方针，就是在集中了广大经济理论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的好的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提高经济效益的十条措施，也是全面提高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

然而，对于什么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关键，在理论界的讨论中意见也不完全一致。比如有的同志认为，搞好经济调整，是提高经济效益的一个决定性关键。也有同志认为，从长远看，提高经济效益的关键，在于进行经济体制的彻底改革。

对于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的关系，许多同志认为，它们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既有统一方面，又有矛盾方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提高宏观经济效益是提高微观经济效益的目的与出发点，微观经济效益是宏观经济效益的基础和实现手段。因此，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相结合，要以宏观经济效益作指导。但有的同志持不同的意见，认为在当前调整时期，为了改变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当务之急要注意提高宏观经济效益，但从长远看，提高微观经济效益还是主要的。还有些同志认为，任何时候都不能把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割裂开来，静止地强调以谁为主。

此外，对评价经济效益的指标，也还有分歧。如何制订科学评价各种经济效益的标准和指标体系，并相应地提出一套完整的科学方法，开展决策程序、决策方法的研究和对各项经济决策的可行性研究，使经济效益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的统一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还有待经济理论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五、关于价格问题

当前我们面临的价格问题很多、很复杂，由于现行的价格体系中许多产品的价格和价值严重背离，已妨碍某些产品的生产，造成企业之间苦乐不均，甚至给一些投机倒把的人留下空隙。价格体系不改革，也影响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但物价问题又很敏感，牵涉各方面的利害关系，甚至可能涉及社会政治的安定。在合理的全面改革方案制定出来之前，目前只能实行“基本稳定、个别调整”的方针，不能轻举妄动。因此需要作比较充分的理论研究，首先编制一套有充分根据的理论价格，作为将来调整价格体系和制定改革方案的依据。理论价格的讨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

许多同志认为，理论价格是按照马克思主义价格形成理论计算出来的价格。但什么是理论价格，看法则不相同。

有的同志提出，理论价格应当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基础价格，就是按照商品价值或价值的转化形态测算的价格。它能够比较准确地计算和反映国民经济的比例，计算和比较企业与社会经济效益。第二，供求价格，就是在上述基础价格的基础上，考虑供求规律的作用测

算的价格。它可以平衡供求，所以也称作平衡价格。第三，决策价格或叫目标价格，就是根据国家资源政策、分配政策，在基础价格基础上并参照供求价格测算的价格。它应当成为促进生产和流通，指导消费，合理利用资源，调节国家、企业、集体、消费者各方面利益，使国民经济取得最大经济效益的价格。

有的同志则认为，理论价格只应包括基础价格和供求价格。反映国家政策的决策价格或目标价格，不应称作理论价格，而且政策因素也无法计算。

还有的同志认为，理论价格就是基础价格。它由产品社会成本和按平均资金（或工资）利润率确定的利润额构成，是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的基础。供求价格和决策价格，由于是考虑供求和国家政策测算的，已不具有理论意义。

测算理论价格还要解决价格形成的客观基础问题，就是要研究形成各类产品价格的社会成本和利润两个部分。目前，企业的产品成本比较混乱，有些企业把不应计入成本的一些开支也打入成本，加上我国固定资产折旧率低，折旧费也偏低。由于个别成本就不准确，如何来准确计算社会成本，就值得进一步研究。怎样确定产品价格中的利润额，有的主张按综合利润率（比如30%按工资利润率，70%按资金利润率）来确定，有的主张按平均资金利润率来确定。怎样确定比较合理，也值得进一步讨论。

我国的价格补贴越来越多，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这个问题过去很少公开讨论，近一年来已有一些同志进行了研讨，但看法还不一致。有的同志认为，财政对价格补贴不符合价值规律的要求，它使价格与价值背离，在居民收入中形成不合理的再分配，不利于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不利于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也不利于解决当前财政赤字和国民经济的调整。也有同志认为，价格补贴是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出发而采取的稳定物价的重要措施，只要有计划价格，就应有价格补贴。还有同志认为，价格补贴有二重性：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对发展生产、保持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以及安定人民生活有利；另一方面，使某些价格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其价值的变化，削弱价格的杠杆作用，加深价格结构的不合理，影响产品比价关系，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因此，不可不补，不可多补。看来，对价格补贴还需要具体分析，究竟哪些是合理的应当保留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应当取消的，应根据什么原则权衡其利弊，如何考虑可能引起的连锁反映，必须深入研究后才能加以解决。

六、关于经济发展战略问题

从1981年2月开始，首都经济界、科技界及有关部门已经举行了六次座谈会，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进行了讨论。前几次讨论，侧重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把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作为战略目标；后几次讨论，侧重于财政、投资与经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与经济发展，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等问题。与此同时，报刊上也陆续发表文章参加讨论。所以有的同志说，发展战略的讨论，是前两年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讨论的继续和发展，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确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而进行的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讨论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讨论中，许多同志对必须改变我国的发展战略目标，即将过去长时期以来把国家工业化、经济增长速度、增加某种产品（如钢）的产量作为发展战略目标，转变为以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作为发展战略的目标，已取得了一些共同的认识。但也有同志认为，经济增长速度与满足人民需要并不矛盾，问题在于速度的内涵。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是要由一定的经济增长

速度来满足的。关于对人民的基本需要的具体内容及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各个阶段（特别是本世纪末）的指标问题，讨论还未充分展开，有待今后继续研讨。

讨论中，许多同志对农业发展战略很关注。这是因为农业在实现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的发展战略目标中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而我国目前农业落后，农业问题已成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极重要的问题，必须把发展农业放到战略地位上来考虑。因此，农业发展战略成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讨论过程中，有的同志持“大农业”观点，认为农业发展战略应该包括农、林、牧、渔和多种经营；也有的同志认为农业发展战略必须把粮食放在主要地位。争论还在继续中。

发展战略在我国来说还是一个新课题，不仅对要讨论哪些问题还有待讨论，而且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定义、对象等问题，人们的认识也并不一致。有的同志把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说成是一个国家为了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而准备采取的带根本性的措施；有的同志说它是研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规律性的东西；也有同志说它是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规定的总的方针政策；等等。对于它研究的对象，有的同志提出，至少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经济、社会、科技。经济方面又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流通）、消费，以及再生产过程中的积累等领域；社会方面，除了经济问题以外，还包括人口、教育、卫生、文化等问题；科学技术方面也包括一系列的领域。一个新问题的提出或一门新学科的建立，开始时认识有分歧，设想也不完备，这是并不奇怪的。问题是如何尽快确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对象，明确它与其他学科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以便使讨论深入一步。

可喜的是，有许多省、市也组织了关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的讨论，并结合本省、市的情况，讨论了省、市的有关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例如，上海市1981年曾讨论了八十年代上海工业的发展战略问题；1982年上半年还准备讨论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方向、目标，上海经济发展的新路子，上海城市建设与人民生活，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技术发展的结合等问题。可以预料，这个问题的讨论将会吸引更多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参加。

一年来的研讨，除了以上六个问题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讨论得较多的还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等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存不存在劳动力所有制等问题也继续有所讨论。部门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其他经济学科也都有所研讨。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转向一条新的路子，赵紫阳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经济建设十条方针正为全国人民学习和贯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新情况将不断出现。经济理论工作，应该随着时代的前进，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推向前进。这就必须从实践中不断汲取营养，使理论同实际相结合，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值得提及的是，1981年国务院成立的经济研究中心和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推动和促进了经济研究工作理论联系实际，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可以预料，这两个研究中心今后在组织重大课题的研究、推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等方面，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近年来，一些新的学科纷纷建立，这是我国经济学界的一个新的气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是否要叫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学，姑且暂不论，它所包括的范围无疑是比较广泛的，并把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科技发展结合起来。其他如生产力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国土经济学、海洋经济学、技术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不论它们是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

或者是边缘学科，但无疑既涉及经济问题，又涉及技术问题与自然界的问题，在讨论这些学科的时候，既有经济学家参加，又有生物学家、植物学家、土壤学家、海洋学家、工程学家、数学家、技术专家、经济管理人员等等参加。这种经济学家同自然科学家、技术专家之间的互相学习、互相切磋、取长补短，将有利于以上学科研究的发展。有的同志两年前就呼吁过经济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合作，看来，这种合作已经在不同的范围不同的程度上开始实现，并呈发展趋向。今后，随着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组织有关重大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和其他学术团体组织的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的增加，经济学者、自然科学者和技术专家将共同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科学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

近年来，我国加强了同国外的学术交流，吸收了国外某些有科学价值的研究成果为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科学事业服务。这种有益的交流活动，今后还将继续发展。但由于社会制度不同、历史传统有异，怎么样能够适合我国国情，汲取国外学术上的精华，去其糟粕，这不仅应取慎重的科学态度，而且还必须提高鉴别能力。一年来，有的同志对引用“第三产业”等概念提出了异议，有的同志对一部分青年学生产生的“西方热”表示担忧，这不是不值得重视的。为了提高识别能力，回答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必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日子即将到来，我国学术界正在筹备纪念活动。学习、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科学发展，是中国理论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可以预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我国的经济理论研究必将取得更大的进展，结出丰硕的成果。

1981年重要经济学术会议简介

《经济动态》编辑部

刘翰辰 李秀珍

全国货币理论讨论会（首次会议）

时间：1981年1月5日至1月14日

地点：广东广州

主办单位：中国金融学会、广东金融学会。

参加人数：126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1. 关于人民币的价值基础问题；
2. 关于货币流通的范围及其正常的标志问题；
3. 关于通货膨胀问题；4. 关于信用膨胀问题；
5. 信用膨胀与通货膨胀的关系；6. 关于外汇兑换券的问题。

大会还收到论文等130余篇。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讨论会

时间：1981年1月6日至14日

地点：辽宁沈阳

主办单位：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辽宁省计委经济研究所。

参加人数：170多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1. 三十年来综合平衡工作的主要经验和教训；2. 如何以调整为中心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3. 怎样正确处理发挥地区优势和全国综合平衡的关系。第二个问题是重点。

大会收到论文60多篇。会后编辑了一本论文集《论综合平衡》，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国营农场经济学术讨论会

时间：1981年2月

地点：云南昆明

主办单位：农垦部

参加人数：110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农工商联合企业、生产责任制和技术经济三个方面的农垦经济问题。

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战备第一至六次座谈会

时间：1981年2月、4月、6月、8月、11月、12月

地点：北京

主办单位：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国家科委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专业组办公室、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全国世界经济学会、理论方法组

参加人数：150多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第一次会议：为什么提出要研究发展战略问题？如何深入探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世界上其它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选择上的经验教训等。

第二次会议：我国农业发展战略问题。

第三次会议：农业发展战略问题：介绍奥塔·锡克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我国特区经济的问题。

第四次会议：关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经济关系问题以及我国的对外经济。

第五次会议：财政、投资与经济发展问题。

第六次会议：我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外经济关系战略。具体讨论了对外贸易战略；利用外资战略。

企业管理工作座谈会

时间：1981年2月12日至19日

地点：上海

主办单位：中国企业管理协会

参加人数：110余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1.关于学习上海企业管理的问题；2.交流与实地参观内外结合的形式，探讨如何提高现有企业管理水平问题。

全国第三次人口科学理论讨论会

时间：1981年2月21日至27日

地点：北京

主办单位：中国人口学会

参加人数：320余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1.关于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这两种生产理论问题；2.关于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与马尔萨斯人口论；3.关于人口规划 and 适度人口。

大会收到210多篇论文。

行为科学学术讨论会

时间：1981年3月3日至8日

地点：北京

主办单位：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会议的主要议题：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如何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并使之形成一门现代科学。具体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1.关于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科学化问题；2.关于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国家的行为科学问题；3.关于发掘我们民族的历史遗产问题；4.关于建立社会主义中国的行为科学问题。

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举行第二次年会

时间：1981年3月19日至26日

地点：北京

主办单位：中国企业管理协会

参加人数：230人

会议主要议题：如何在经济调整时期加强企业管理；如何从实际出发，学上海，整顿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如何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学习和运用外国企业管理经验等。

我国现阶段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问题讨论会

时间：1981年3月27日至4月5日

地点：四川成都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编审组、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

参加人数：200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1.若干年来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上的主要教训是犯了“左”的错误；2.我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问题；3.各种所有制内部的若干问题——全民所有制与国家所有制，城乡集体所有制，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

经济效果理论问题讨论会

时间：1981年3月24日至31日

地点：河南郑州

主办单位：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国家建委经济研究所、河南省计委和河南省建委。

参加人数：270余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对我国三十年来经济效果的分析以及如何提高经济效果；经济效果与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改革的关系；发挥地区优势与宏观经济效益的关系。

大会收到论文130余篇。会后编辑了三本论文集，分别由社会科学出版社、财经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首次举行学术报告会

时间：1981年3月19—20日

地点：上海

主办单位：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上海财经学院经济系。

会议的主要议题：胡寄窗教授作《从世界范围看十七世纪前中国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学术报告。

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

时间：1981年4月16日至25日

地点：四川成都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四川

省社会科学研究院。

参加人数：351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1.关于调整的目标与步骤问题；2.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正确处理国家、企业、职工三者的利益分配问题；3.关于实行以税代利、自负盈亏问题；4.关于改革企业内部领导体制问题；5.关于工业改组与企业联合的问题；6.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问题。

大会收到论文、资料126篇。

关于建立中央银行制度问题的座谈会

时间：1981年4月22日至30日

地点：江苏无锡

主办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

参加人数：30余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适应经济发展战略要求，建立统一的金融体系；建立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的中央银行。

决策的科学方法学术讨论会

时间：1981年4月24日至28日

地点：北京

主办单位：中国科协委托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中国未来学研究会、中国科研管理研究会。

参加人数：230多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决策需要科学化，要接受决策不科学化的教训，要大力发展决策科学，领导要努力学习决策科学。

大会收到论文120多篇。

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首届年会

和第二次调研工作会议

时间：1981年4月29日至5月8日

地点：四川成都

主办单位：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

参加人数：110余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一）开展学术交流和学术讨论并总结一年多来的学会工作。（二）学术讨论重点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与今天”及“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的发展经济学”问题，还讨论了如何正确对待资产阶级经济学问题。

大会收到论文53篇。

《经济学动态》编辑部举行座谈会

分析当前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新动向

时间：1981年5月4日

地点：四川成都

主办单位：《经济学动态》编辑部

参加人数：20余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讨论分析当前资产阶级经济学的

新动向；对外国经济理论的宣传报道，应当有分析，要反“左”防右。

中国成本研究会第二次理论讨论会

时间：1981年4月29日至5月8日

地点：江苏无锡

主办单位：中国成本研究会

参加人数：140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在经济调整时期抓好成本和成本管理上有特殊重要意义；成本是进行宏观经济决策的一项重要依据；总结经验，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成本管理体系；关于成本的经济本质。

大会收到论文70多篇，会后编辑了一本论文集，由广播出版社出版。

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举行第一次讨论会

暨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成立大会

时间：1981年5月28日至6月3日

地点：北京

主办单位：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

参加人数：350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开展国土经济学研究的意义；国土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国土经济学研究的任务与主要内容；有关国土工作的建议。

大会收到论文400多篇。

中国统计学会第二次科学讨论会

时间：1981年5月25日至6月3日

地点：河北北戴河

主办单位：中国统计学会

参加人数：110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对象和性质问题；数理统计方法在社会经济统计中的应用问题；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是不是两门学科的问题；建立和健全国民经济平衡核算体系，加强综合平衡统计问题；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划分问题。

全国高师《资本论》研究会首届理论讨论会

时间：1981年5月29日至6月5日

地点：福建福州

主办单位：全国高等师范院校《资本论》研究会

参加人数：100余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1.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理论的最初论述；2.我国现阶段扩大再生产类型的选择；3.扩大再生产中两大部类的对比关系；4.资金的运动和效果；5.社会总产品的计量方法问题；6.今后《资本论》的教学与研究。

大会收到论文50余篇。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学术讨论会

时间: 1981年5月上旬

地点: 江苏南京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南京大学历史系

参加人数: 42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认识问题; 关于生产力研究的重要性问题; 关于萌芽的社会经济条件问题; 关于国内市场问题; 关于地区和行业萌芽实况的研究; 关于封建行会制度问题; 关于农业中有无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关于农业雇工的性质问题;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的原因问题; 对今后萌芽问题的研究方法讨论方面的建议。

大会收到论文28篇。

首都经济理论界座谈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问题

时间: 1981年6月12日至26日

地点: 北京

主办单位: 《经济管理》编辑部

参加人数: 60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划分标准以及如何具体划分的问题(包括服务劳动是不是生产劳动)。

影子价格讨论会

时间: 1981年6月

地点: 北京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数量经济研究室

参加人数: 20多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什么是影子价格、影子价格与劳动价值的关系、影子价格的作用。

海洋经济座谈会

时间: 1981年6月24日至26日

地点: 北京

主办单位: 国家海洋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参加人数: 20多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筹备召开全国第一次海洋经济理论讨论会, 并成立海洋经济研究会。座谈会讨论了海洋经济研究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国营企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讨论会

时间: 1981年7月19日至31日

地点: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主办单位: 中国财政学会、财政部税务总局、黑龙江省财政学会。

参加人数: 100人左右

会议的主要议题: 国营企业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问题。具体讨论了企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应解决的问题: 一、要确定国家与企业在企业收入分配中的一个合理数量界限; 二、要加强经济责任; 三、税制要改革; 四、各种经济杠杆要配合运用, 各种体制改革要尽可能配套同步进行。

全国环境经济学学术讨论会

时间: 1981年7月13日至17日

地点: 江苏镇江

主办单位: 中国环境管理、经济与法学学会

参加人数: 80余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有关环境经济学的两重性问题; 有关环境指标体系问题; 有关环境保护的经济效果问题; 有关运用经济手段管理环境的问题。

计划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讨论会

时间: 1981年7月16日至24日

地点: 北京

主办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

参加人数: 20多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1. 关于计划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2. 关于计划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3. 关于学科名称问题。

在业人口划分标准问题讨论会

时间: 1981年8月21日至23日

地点: 北京

主办单位: 中国人口学会委托北京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

参加人数: 60多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1. 划分在业人口的意义; 2. 划分在业人口的标准(原则)问题; 3. 在业人口的定义; 4. 城乡在业人口是采用一个标准还是不同标准; 5. 关于在业人口包括的范围和临时性职业人口的划分问题。

全国第三次畜牧业经济理论讨论会

时间: 1981年8月28日至9月7日

地点: 新疆乌鲁木齐

主办单位: 农业部畜牧总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所。

参加人数: 120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关于畜牧业经济结构的调整问题; 关于所有制和生产责任制问题; 关于生产和流通问题; 关于牧、工、商一体化问题; 关于长远规划问题。

大会收到论文及调查报告160篇。

全国农业经济问题讨论会

时间: 8月20日至28日

地点: 山东省烟台市

主办单位：中国农经学会（受国家农委的委托）

参加人数：191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农业生产责任制；农业区划；农业生产结构；农产品成本和价格；农产品收购制度；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农、工、商综合经营；农业现代化。

大会收到论文和调查报告117篇。

卫生经济学和医院经济管理学术讨论会

时间：1981年8月

地点：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主办单位：卫生经济学研究会（筹）

参加人数：近100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关于开展卫生经济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关于卫生经济学的对象和任务；关于医务劳动的性质；关于健康投资及其经济效益评价；关于医院经济管理在医院科学管理中的地位、作用和方法；关于医务成本及医疗收费标准；关于医疗卫生的技术经济指标体系。

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首届年会

时间：1981年9月3日至9月9日

地点：辽宁大连

主办单位：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

参加人数：209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动员和组织经团联全体会员加强对经济科学的研究，为我国经济调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东北三省中国经济史学会举行首届年会

时间：1981年9月21日至26日

地点：辽宁丹东

主办单位：东北三省中国经济史学会

参加人数：70余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经济根源和中国封建经济的特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特殊性和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东北经济的历史演变和日俄帝国主义对东北的经济侵略。

年会将编印中国经济史文集，在内部交流。

基本建设投资效果问题的讨论

时间：1981年9月19日至26日

地点：山东泰安

主办单位：中国财政学会、建设银行总行、山东省财政厅、建设银行山东分行。

参加人数：130人

会议主要议题：怎样提高基本建设投资效果；控制建设规模，缩短建设周期；扩大生产主要依靠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管好用好固定资产折旧

发挥地区优势 提高经济效益讨论会

时间：1981年9月6日至13日

地点：宁夏银川

主办单位：中国财政学会、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局、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学会。

参加人数：77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关于民族地区财政问题。提出民族财政问题的理论依据和客观必要性；关于民族财政的含义和它的研究重点；关于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的自主权问题；关于保护和发展民族经济的问题；关于民族地区财政管理体制问题。

大会收到论文20多篇。

全国建工企业财务座谈会

时间：1981年9月16日至23日

地点：云南昆明

主办单位：中国建筑会计学会筹办组

参加人数：60余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建立经济责任制及有关核算问题；扭亏增盈措施；酝酿筹备成立中国建筑会计学会。

中国会计学会召开学术讨论会

时间：1981年10月28日至11月5日

地点：福建厦门

主办单位：中国会计学会

参加人数：160多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会计的基本职能问题；开展审计学研究、建立审计制度问题；改革会计学科体系问题。

中国财政学会1981年年会暨第五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

时间：1981年10月22日至11月1日

地点：江苏南京

主办单位：中国财政学会

参加人数：150多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着重从财政分配的角度，探讨新形势下生财、聚财、用财之道，挖掘潜力，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为进一步搞好调整、改革，突出抓好整顿，克服当前财政经济困难，逐步实现经济良性循环服务。具体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1.关于研究“三财”之道的重要意义和实现途径；2.关于完善企业经济责任制；3.关于搞好综合财政计划；4.关于改革税制、企业财务体制和发挥支农、基建资金的效果；5.财政、银行的职能及其分工协作的关系等问题。

全国农业经济结构学术讨论会

时间: 1981年10月23日至30日
地点: 湖北武汉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
参加人数: 70人
会议主要议题: 1. 关于农业经济结构的理论探讨;
2. 关于农业经济结构合理性的标准; 3. 关于影响结构的因素。

生态经济学座谈会

时间: 1981年11月9日
地点: 北京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农业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
参加人数: 20余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生态经济学的重要意义; 生态经济学体系; 环境影响评价方法。

帝国主义经济理论问题座谈会

时间: 1981年11月3日至5日
地点: 北京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参加人数: 20余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交流了在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部分教学与研究工作中碰到的问题, 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 研究了如何加强经济理论宣传、研究工作的意见。

商品流通渠道理论讨论会

时间: 1981年11月16日至25日
地点: 北京
主办单位: 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
参加人数: 123人
会议主要议题: 关于商品流通渠道的几个理论问题; 实行多种经济成分, 多条流通渠道, 多种经营方式, 减少商品流通环节的“三多一少”客观依据; 关于充分发挥国营商业的主导作用。
大会收到论文100多篇。

工业改组、企业联合理论讨论会

时间: 1981年11月12日至20日
地点: 湖北沙市
主办单位: 湖北省经济委员会、省经济学会、省工业经济学会、省企业管理协会、沙市经济委员会、沙市经济学会。
参加人数: 100余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工业改组、联合的客观必然性; 经济联合体的所有制性质; 经济联合体的内涵问题; 关于经济联合体需要具备的基础和条件; 关于如何正确处理好经济联合体内外各种经济关系。

我国农村妇女生育率问题专题学术讨论会

时间: 1981年11月23日至28日
地点: 杭州市
主办单位: 中国人口学会
参加人数: 43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弄清当前农村妇女生育率的基本情况, 以及影响妇女生育率的主要因素。
大会收到论文34篇。

中国基本建设经济研究会召开首届年会

时间: 1981年12月1日至5日
地点: 江西南昌
主办单位: 中国基本建设经济研究会
参加人数: 87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1. 缩短建设周期的问题——建设周期的含义、意义、考核办法、缩短建设周期的主要途径、如何提高投资效果; 2. 基本建设经济学的对象和学科建设问题。

中心城市座谈讨论会

时间: 1981年12月8日至13日
地点: 辽宁大连
主办单位: 大连市计委经济研究所、辽宁财经学院经济研究所。
参加人数: 69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中心城市的性质、形成、特点以及如何发挥作用等。有15个中心城市即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长春、哈尔滨、兰州、西安、重庆、广州、杭州、无锡、青岛和大连市的代表经过民主协商, 拟定建立中心城市经济问题研究会(筹备组)。
大会收到论文等50篇。

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讨论会

时间: 1981年12月9日至16日
地点: 云南昆明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参加人数: 109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多样性; 关于包干到户; 加强对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的研究。

中国物资经济学会召开首届年会

时间: 1981年12月11日至17日
地点: 广西南宁
主办单位: 中国物资经济学会
参加人数: 191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生产资料的流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生产资料的社会属性; 生产资料流通中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 多渠道、少环

节、开放的生产资料市场。

全国农商关系学术讨论会

时间：1981年12月14日至21日

地点：山西太原

主办单位：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委托山西财经学院

参加人数：60多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关于农商关系的实质问题；当前农商关系的新形势、新问题；农村商业（主要是供销社）体制改革。

工业结构学术讨论会

时间：1981年12月14日至18日

地点：云南昆明

主办单位：中国企业管理协会

参加人数：60余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交流国内外工业结构改革的经验，从理论上探讨工业结构进一步合理化的问题，也讨论了工业地区结构、工业企业结构、工业组织结构、工业产品结构等问题。

大会收到论文50余篇。

全国第一次《资本论》学术讨论会

暨中国《资本论》研究会成立大会

时间：1981年12月15日至22日

地点：江苏无锡

主办单位：《资本论》研究会（筹）

参加人数：200余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1.《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生产资料优先增长问题；关于经济循环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关于社会主义资金运动和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形式。2.《资本论》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科学技术发展与劳动价值论；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关于所谓“转型”问题。3.关于《资本论》的对象、结构和方法。

大会收到论文200多篇。

第二次旅游经济理论讨论会

时间：1981年12月16日至22日

地点：浙江杭州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

中国旅游游览事业管理局。

参加人数：69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我国旅游事业如何走中国式道路问题。

会议收到论文50篇。

中国质量管理协会召开年会

时间：1981年12月

地点：广西桂林

主办单位：中国质量管理协会

会议的主要议题：提高质量和调整改革、推行全面质量管理、经济责任制紧密结合，以及提高经济效益。

全国社队企业、农工商联合企业学术讨论会

时间：1981年12月

地点：江苏无锡

主办单位：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农业部人民公社企业管理总局、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社队企业管理局。

参加人数：140人

会议主要议题：社队企业、农工商联合企业产生的必然性、作用，以及如何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等问题。

中国金融学会首届年会

时间：1981年12月29日至1982年1月3日

地点：广西南宁

主办单位：中国金融学会

参加人数：300余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①生财、聚财、用财之道；②货币流通的新情况、新问题；③利用外资；④农村金融工作。

大会收到论文230多篇。

亚洲议员人口和发展会议

时间：1981年10月27日至30日

地点：北京

会议东道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参加人数：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十九个亚洲国家的议员、学者，还有国际组织的代表和拉美地区的来宾，共200多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如何使亚洲地区人口和发展相协调的各种途径。通过会议，亚洲各国议员和学者、专家充分表达了各自对人口问题，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的看法，交流了经验，增进了友谊。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人口和发展问题的北京宣言》，呼吁亚洲各国议员在人口和发展领域加强合作，要求亚洲各国人民进一步关心人口和发展问题，争取2,000年在亚洲范围内实现1%的人口增长率。《宣言》建议联合国确定《世界人口日》来提高人们对人口问题的认识。

世界经济讨论会

时间：1981年3月23日至28日

地点：浙江杭州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所与美国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

参加人数：来自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八十多位经